

齐 平 主 编

改革与观念变革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



改革与观念变革

楊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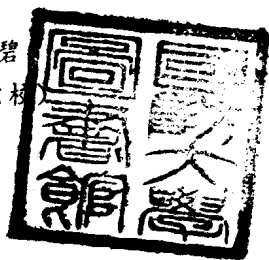
主编 齐 平

作 者

齐 平 刘维润 熊述碧
(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

胡启锐 李效容
(中共乐山市委党校)

曾祥文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

• 1987 •

改革与观念变革

主编 齐平

*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石油局印刷厂印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875 字数 119千字

版次 1987年11月第一版 印次 198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9,500册

中国标准书号: ISBN 7-81016-042-7/C·5

统一书号: 3452·5 定价: 1.40元

前 言

当前,人们对思想观念的变革的广泛重视和理论探讨,是伴随我国改革实践的逐步发展而提出的一个重要课题。这是因为改革的深化,需要人们进行理性的反思,树立新的思想观念,破除旧的思想观念。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更新,不是主观臆想的产物,而是时代的呼唤,实践的需要。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历史不仅是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也是思想观念变革和更新的历史。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而思想观念的变化,又促进着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更新,既不是主观随意的,也不是盲目的和自发的,而是一个客观的、自觉的历史过程。这就要求我们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标准,遵循思想观念变化的规律,运用科学的方法论,逐步实现思想观念的变革,以促进我国的各项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这正是我们撰写《改革与观念变革》的意图。

近年来,国内不少报刊登载文章,一些学术团体召开会议,对我国当代思想观念的变革、更新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有益的探讨。我们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注意吸取了其中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而对那些失之偏颇的观点,则

阐明了我们的看法。

总之，我们力图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方法，考察我国思想观念的历史发展，阐述当代我国人民思想观念的变革以及对未来观念的预测、展望。但是，由于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所限，本书的缺点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这是需要请读者批评指正的。

齐 平

1987年7月于成都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我国思想观念的历史发展	(1)
第一节 原始社会的思想观念.....	(2)
第二节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思想观念	(7)
第三节 战国至唐代的思想观念.....	(12)
第四节 宋至清代的思想观念.....	(20)
第五节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主要思想观念 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26)
第六节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引起我国人民 思想观念的新变革.....	(35)
第二章 社会主义改革需要变革思想观念	(37)
第一节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 然结果.....	(38)
第二节 在社会主义改革中变革思想观念的 必然性.....	(42)
第三节 思想观念变革对社会主义改革的作 用.....	(45)
第四节 在改革中变革思想观念要遵循科学 的方法论.....	(48)
第三章 政治、思想、道德领域的观念变革	(59)
第一节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59)

第二节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71)
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	(85)
第四章	经济、科技、文教领域的观念变革·····	(97)
第一节	树立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观念·····	(97)
第二节	树立发展科技、文教事业的观念·····	(112)
第五章	各个领域共同的观念变革·····	(125)
第一节	树立探索、创新和竞争的观念·····	(125)
第二节	尊重人才、重视信息的观念·····	(131)
第三节	正确对待时间和效益的观念·····	(142)
第四节	树立求实、开放、比较的观念·····	(149)
第五节	我国人民思想观念的新变化·····	(157)
第六章	未来观念变革的预测·····	(161)
第一节	预测未来观念的重大意义·····	(162)
第二节	怎样预测未来观念·····	(167)
第三节	对未来观念的展望·····	(176)

第一章 我国思想观念的历史发展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是历史的积淀。任何社会事象，都是从历史发展而来的，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痕迹和影子。所以，人们常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思想观念是客观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同时，它又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它可以通过人的行为来反作用于客观存在。各种社会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及其机构、设施，都是人们思想观念的物化。思想观念与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史，贯穿于古往今来的历史。

当前，思想观念正在发生变革。它们为什么变革？可能朝哪个方向变革？其速度如何？这些都是人们关心的问题。想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必须研究观念的历史发展，研究观念的物质外壳的历史。历史能够告诉我们，某一思想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它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即：它的基本生存条件是什么）？这些社会条件至今还存在多少？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它要进行哪些更新？何时会被什么观念代替？等等。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它的现实，瞭望它的未来。

我们相信，认识了现存各种思想观念的来龙去脉的读者，一定不会茫然于它们的现实，认真地思考着未来思想观念的读者，也一定会在关心它们现实的同时，也关心它

们的历史。

第一节 原始社会的思想观念

原始社会的思想观念，是原始时代的人们对当时的自然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结构等社会存在的反映。各地区的原始人，由于他们所面临的客观存在不同，他们的思想观念（及其物化的社会制度）也各具特色。这些特征，孕育了现存的各民族的民族特色。

中国原始社会最重要的社会特征，是没有经历游牧时代，直接从以采集、渔猎并存的经济过渡到农业、渔猎并行的经济。¹ 这个转变开始于新石器时代以前。早在裴素岗——磁山文化时期（距今7700年以前），我国已出现了典型的农业文化。²

在土质松软、茂林修竹遍布的古代黄河流域，以农业为本的生活方式，首先就要求人们较安定地居住于某地。只有通过几代人的披荆斩棘的辛勤劳动，生活环境才能得到逐步改善。郑国立国之初，先辈们“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处之”，³ 累代经营几十年后，才渐臻繁荣。楚国的先民也曾“筚路蓝缕以启山林”，⁴ 几十年后才建成富强的国家。原始人类每到一块地方后，因为他们使用的工具比郑、楚先民所用的更原始，他们所付出的劳动也就更艰巨，所耗费的时间也就更长。

工具越简陋，对地理条件越挑剔。当某地区较易开垦的土地地力都耗尽时（原始人不会积肥，天然的地力总有耗尽时），全体人民都得迁徙新地。当某地区人口增殖到周围较易开垦之地的生产物满足不了需要时，就会有一部

分人迁徙新地。迁徙者与旧居者关系逐渐疏远，他们的后人也只尊重本块土地的开辟者。周代的宗法制度规定“别子为祖”（别封之子为他的子孙的始祖），⁵¹即源于此。

因为每一块土地的发达，都是历代先驱的辛勤劳作所致，后人们分享着祖先的恩赐，所以，“祖先崇拜”观念便发达起来。原始社会遗址中出现了许多受祭祀的偶像，即是证明。

崇拜、尊重祖先，相信祖先与“上帝”同在，是中国宗教的一大特点。要古代中国人放弃祖先崇拜而信其他天下独尊之神，佛教、基督教等都曾作过努力，但都没有成功。

各人有不同的祖先，每个聚落有不同的崇拜对象，这种宗教感情又是如此深厚，使得统一的宗教从不能在中国出现。市场很大的统一宗教，在中国也行不通。西方传教士声称中国人“宗教意识淡漠”，这个“宗教意识淡漠”是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的。但正由于中国的宗教意识不统一，也使中国文化易于宽容地对待外来文化，容许其在国内传播。各种思想基本上都能在中国立足。中国人也从不是为了别信自己的神去流血，从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

中国从没有产生精神上对全体人民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教主”，这为专制君主、国家机构树立威力、让人们崇拜他们，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崇拜权力，成为中西文化的一大区别。同时，民间缺乏统一的宗教意识，也影响了血缘团体之间的内聚力。当血缘团体基本解体后，若无号召

力的政权产生，全民族更有变成散沙的危险。这一现象，在宋以后多次导致对外战争的失败，其根源其实是潜伏于原始社会的。

长期定居生活，人们必然重视经验。长者老者于是受到特殊尊敬。“长老”们永远是基层政权的实际掌握者。一些不紧密联系实际的思想、观念，都被摒弃。知识来自感性的积累，而不是逻辑推理、哲学思辩，中国的思辩哲学、逻辑学一直不发达，也很少产生适应于这些学问发展的“类概念”，⁶不能说与此无关。自然科学的创造，也因而受到压抑。中国文明发达较早，又未曾中断，所以领先世界几千年。但当欧、美文化兴起时，很快就超过了中国。落伍于世界的事实出现于三百年以内，而落伍的原因却必须追溯到三千年以外。

尊重祖先，就必须为了有人祭祖、为了宗族而生儿女，为延续发展祖先的事业而生育。而且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形下，只有扩大劳动队伍，增殖劳动，才能较迅速地发展祖先的事业，首先是“有后”。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其次要“多子多孙”。生儿女不单是为自己的利益，更不是爱情婚姻的硕果，而最主要是为祖先尽的义务。夫妻感情是稳固而矜持、含蓄。⁷为了生子女、让子女有良好的成长条件，家庭的生育功能、教养功能受到了特别突出的重视，形成中国家庭的主要特色，直到如今。建立稳定的家庭，在其他地区一般是石器时代末期甚至铜器时代末期才提上议事日程的。而黄河流域的考古材料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初期以前（与农业文化的发明同时），个体家庭就诞生了。裴李岗文化发现的穴居遗址，

内有饮食用具、烹调用具、储藏用具，显然是独立的消费单位，而其面积之小，只能容纳一个小型家庭。大量发现的粮食加工工具四足石盘磨，也只配小家庭使用。⁸ 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几十座房屋，都是炊具、食具、储存器一应俱全，灶边还能见到食余的果壳和动物骨骼，可它们的面积也只有十平方米至三十平方米之间。这里的消费单位也只能是小家庭。⁹ 这些小家庭，并非爱情发展的结果，只是“孝”观念的物化。随着社会的进步，为巩固家庭而制定的规范日趋繁杂。但其开始是在原始社会。

农业经营单位很小，自古以来农民就“老死不相往来”，¹⁰ 养成了待人平和、自力更生等美德，也养成了狭隘、对人漠不关心、与世无争、枪打出头鸟等“小农意识”。这对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影响极大。马克思曾深恶痛绝地批判这些“小农意识”。¹¹

每一个居民区，它的人民有的是出自同一的祖先，彼此为“血亲”。有的本来不是同一祖先，但由于“同姓不婚”、“血亲婚姻禁忌”，只能与异姓通婚，所以，定居几代人以后，这些异姓人也有了婚姻关系，彼此成为“姻亲”，它包括：血亲之配偶；配偶之血亲；配偶的血亲之配偶（除掉那些本来与自己已是血亲的人）。古人将这些人总称为“兄弟舅甥”，又称为“姻亲”（“姻”指姻亲，“亲”指血亲。古汉语简略，一个字表示一个词）。在这个团体中，民主“举贤与能”，¹² 产生自己的首领（一般是“长老”）。随着耕地的扩大、交通的发达、水利设施的产生，跨姻亲集团的公共权力机构应运而生了。本集

团的长老在这个更大范围内的公共权力机构之中能扮演什么角色，主要取决于本集团的力量，其次才是本人的才干。在这里，政治经济权利的竞争单位是团体而不是个人。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阶级社会，波及于今天，对中国的政治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详后）。与农业密切相关的自然科学如天文、气象等受到特别重视。“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历法。”仰韶文化遗址就出土了日月星辰画面，表示了它的特殊地位。商代卜辞中，关于天气的占大半。在汉以后这一畸形越来越明显。影响中国几千年自然科学的一些特点，早就孕育在原始社会之中了。

原始社会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文化传统。除上文涉及的外，还有许多为叙述的方便而放到了下一章，还有许多限于篇幅而无暇顾及。就上文提到的思想观念来看，大部分都还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现代社会。其中的一部分是我们的宝贵遗产，一部分则是应该剔除的糟粕，但它们本身却是一个文化的产物，一根藤上的瓜，一个难分难解的文化丛。没有科学的态度与方法，没有认真细致的研究，我们就往往继承不到想继承的，消灭不了想消灭的，而且还会无意中扩大文化的毒素，糟踏民族文化的精英。“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的愚忠、愚善、权力崇拜、禁欲主义等观念扮演了令人痛心的角色，给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这是值得我们永远警惕的。

注：〔1〕徐中舒《东亚大陆牛耕之起源》等论文、吕思勉《先秦史》等。主张此观点的学者甚多，无法遍举。持反对意见的人今天已很少。

- 〔2〕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146页，《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和研究》有关章节和考古发掘报告。
- 〔3〕《左传·昭公四年》。
- 〔4〕《左传·宣公十二年》。参见《昭公十二年》。
- 〔5〕《礼记·宗法小记》等。
- 〔6〕黑格尔曾举例说，中国有数以千计的表示动物、植物的名词，但却没有“生物、动物、植物”这些普遍名词。当然也没有“思维”这些更抽象的词。
- 〔7〕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观察社《观察丛书》第四，1948年4月版。
- 〔8〕《考古》1978年2期、1979年3期的发掘报告。
- 〔9〕《西安半坡》第4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10期。
- 〔10〕《老子》80章。参见徐中舒《论尧舜禹禅让》文，载《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2期。
-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9卷148页至149页。
- 〔12〕《礼记·礼运》

第二节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思想观念

安土重迁，对老幼都承担沉重义务的农业生活，养就了坚忍、勤俭等品德。

人类社会的初期，“剩余产品”（维持生存的最低必需品以外的产品）就有可能产生。因为，早在人类从猿到人的过渡之中，随着人类的进化，劳动产品就开始趋于增多了。否则这一漫长的进化过程就会丧失原动力。人类形成后，他们的生活品增多的速度更快了。恩格斯曾经利用摩尔根提供的材料，详尽地叙述了食物增殖的过程。^{〔1〕}后

代所获得的食物，总能比前代人多。如果他愿意保持先辈的生活水准，或有外在的力量强迫他象他的先辈那样生活，他们就可能有“剩余产品”了。为了老幼生活得好一些，辛劳的中国人很早就开始积累“剩余产品”了。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出土了死者随身携带的装饰品，生活用具和食物，也许还穿有衣服，只因年深月久而腐烂无痕了。这些财富，都可以视为当时个人的“剩余产品”。

“剩余产品”的存在，为奴役制提供了前提。但是，“物质基础”只是社会变革的“被动因素”。国家的出现，还需要“人”的因素。并不是经济条件一成熟马上就可能导致社会制度变革的。

血缘团体内部，为了共同的祖先，为了团体的繁衍嗣，开始无例外地是严禁奴役现象发生的。强有力的劳动者，即便是游牧民族、狩猎民族等其他民族之中，也不能占有别人的劳动，而且还必须转让自己的部分劳动，这是社会生产得以延续的必要条件，²而人类的生产只能是社会生产。更何况在以农为本的中国，耄耋之年的长老实际执掌着政权。

只有当对外族的掠夺所获已能达到如此程度——除抵偿路途交通所需要的开支，战争中的人力物力损耗之外，还能有许多盈余——之时，当掠夺物的丰厚足以使淳朴安分、胆小怕事、不尚武力的小农们动心之时，只有此时，掠夺队伍才能形成。至于集团之间的征服，发生得更晚。因为，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征服，不能给征服者们带来同样的利益。只有征服者之内有了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强

权，才能组织出武器不占优势而战斗力却较强的战士队伍（原始时代，团体之间的兵器差异是不大的，优势取决于组织结构），才能征服得了比征服者更多的人民。也只有有了那些出力少、而能获得最大好处的征服者首领，才会有人对征服十分热心，不惜本集团的人力物力。

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前后，大规模征服战争出现的条件成熟了。邻近的血缘集团联合起来形成了古“民族”。夏、商、周三大氏族相继兴起，先后征服其他民族而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

由于国家产生的直接途径是血缘集团之间的征服，所以，国家的统治基础必然首先是最高统治者所在的那个血缘关系网。商王依靠“众戚”来分统人民，¹³¹周人也一再强调，“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补察其政”，¹⁴谁要是敢“弃亲用羈”，必遭不祥。¹⁵

联盟者的首领们自然要加入统治集团，就是那些被征服地区的基层长老，与故主并无密不可分的关系，与新主亦非不共戴天。他们治理人民有一套办法，而征服者内部最高权力的专制性不强，还不能为所欲为地支配整个血缘团体，大小血缘团体的长老们（即阶级社会的贵族们）仍有一定牵制力，征服者也就无力将他们的权力深入被征服地区的基层，只能维持原有的社会结构，任用原有的长老统民。例如，怀姓九宗本来是夏的同盟者鬼方的一部分（怀鬼同音通用）。夏亡后，它成为商王朝的一部分。¹⁶商亡后，它又成为周王朝的支柱，在晋国“世为晋强家”，还能干预晋国最高统治权的继承问题。¹⁷¹

在王的下面，是同姻亲集团的、同盟的、被征服地区

的三种组织的首领。后二者也受到高度重视。周人说：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兢、吁（呼）俊尊上帝”（清人对此话解释为：“惟夏王时，其巨室多贤，其君招呼贤俊以尊事上帝。”），⁸ 这里的“巨室”包含了同盟者、被征服者中的大族。商王之下，除了分派子弟到全国治民形成一个个强宗大族之外，也招纳了不少“自然成长起来的结构”的首领，甲骨文记录了商代的一部分诸侯大贵族。⁹ 周代，商贵族微子、辛有以下，不知有多少贵族世代在朝庭为官。¹⁰

各种官员地位的高低自然与王的信任程度有关，但重要的因素是他们各自所在的血缘团体的势力。原始社会即已存在的那条规律依然有效：政治权力的竞争单位不是个人，而是集团。因为团体的力量较稳定，盛衰都有一个较长期的过程，所以，许多贵族得以“世官”。因为如此，夏、商、周都出现了不少窃居高位（包括王位）的庸才。但是，由于当时的文化权还在贵族手中，平民极少有受教育的人，经邦治国的人才主要在贵族中产生。

包括王在内的官员们权力基础是各自的血缘集团，所以他们对于本集团（家族、宗族）的兴衰十分关心。甲骨文表明，商王非常关心他的“众人”（即族人）的祸福。周人形成了一系列乡规民约，努力“利民”，¹¹¹ “听于民”，¹¹² 经常“分贫振穷、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救灾患、宥孤寡”，¹¹³ 以维持族的稳固、团结，不使族人离散。为增强竞争力，还必须尽量将其全族的人力物力集中。政治上要求族人孝敬长老，忠于族长，“奔走事厥长”¹¹⁴，对脱离乡里、比农民出力少而获利多从而对农